

《孙子兵法》中的和平思想

□ 王坤鹏

《孙子兵法》诞生于春秋末年社会政治军事大变革的时期。这一时期上承夏至西周千余年的早期国家发展阶段，面临中央王权衰落、地方势力蜂起的局面，军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。虽然如此，被后人誉为“百代谈兵之祖”的《孙子兵法》并未沉溺于杀人、攻城术等的讨论，而是处处提示人们，贸然动兵会对国家与人民造成不可想象的伤害，战争的目的恰在于安国保民，由此表达了深切的和平思想。

孙子论“用兵之害”

孙子亲历春秋末年兵戈日起、战争日益残酷的局面，对战争巨大的耗费及破坏性洞若观火，故《孙子兵法》中多处提到国君与将领要尽知“用兵之害”。

春秋末年，兼并战争开始出现，过去小国寡民形势下那种“君子之争”的战争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、多兵种、长时段的野战与攻城战。以孙子所在的吴国为例，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中说吴王夫差“地方二千里，带甲七十万”，其战士人数可能有所夸张，不过也能反映此时战争的规模相较过去已有了很大扩展。越灭吴之战，越王勾践作战前动员，要求战士中的独生子、老弱病残等人报告并退出战斗；兄弟多人从军的，也要报告并退出一人。不过据《国语·吴语》所记，结果是“莫告”。也就是说，越国几乎所有丁壮都投入了这场战争。

在上述情势下，战争的花费以及战败的代价都是巨大的。《孙子兵法·作战篇》说，“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”，驰车指轻型冲锋车，革车是蒙着牛皮的重型战车，带甲指全身披甲的战士。1000辆轻型冲锋车、1000辆重型战车、10万名披甲战士，是春秋晚期常见的武力配置。如果再加上不被甲的战士以及后勤辅助人员，一场战役需要投入的人力、物力难以计数。孙子指出，维持这样一支军队，“日费千金”。

不唯如此，为了支持战争，整个

国家要立即转为战时状态。《孙子兵法·用间篇》记述了春秋晚期吴国面临战争时的情状：“内外骚动，急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万家。”所谓“七十万家”，若每家出一名丁壮从军，则正可与上引《淮南子》所载吴军“带甲七十万”相对应。70万名丁壮从军作战，势必会影响到70万个家庭正常的生产活动。最终一场战役下来，即使在战胜的情况下，也通常导致“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；公家之费，破车罢马”，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公家，都是车马疲惫、资财消耗的结果。

正是看到战争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伤害，孙子指出军事乃“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”。关于这句话，人们过去多强调孙子说的是战争胜败对战胜者的影响。实际上，即使对战胜国，战争亦会造成巨大的破坏。故孙子所谓“存亡之道”的说法，强调的是慎战乃至不战，做到“兵不贵久”。

“非攻”与“善守”

说到“非攻”，往往会将“发明权”归于战国早期的著名思想家墨子。墨子认为，一国牺牲数万条人命去攻城，即使胜利了，最终所获得的也只是一座空荡荡的废墟；统治者发动战争，竭尽财物，兴师动众，使民众无法从事其本业，各级官员亦无暇治理政事，社会就容易产生混乱，缺乏法度。

就目前文献所见，孙子应是最早明确提出“非攻”的学者。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说：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。”顶级的军事家，并非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大将军，而是能够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谋略家。不发动战争就能使敌方屈服，在常人看来似乎是痴人说梦，实则并非不可能。如何达到这一效果呢？孙子给出的答案有两方面：一是“形”的积累，二是“势”的营造。

所谓“形”的积累，就是踏踏实实地提升自身实力，做好全方位的准备，即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中所说的

“不可胜在己”，使自身不可被战胜，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，如此才能“立于不败之地”。

所谓“势”的营造，即通过时间、实力、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努力与转化，使整体局势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推动，对敌方形成碾压态势，最终甚至不动刀兵即可达成目的。故孙子强调善战之人“无智名，无勇功”，他们能够将战事化解于无形，并获得胜利。这种胜利并非通过赫赫战功来实现，故通常不为民众所知晓。

相较于不计代价的进攻，孙子更强调“善守”。在孙子看来，将防守做得充分，正是扭转形势、胜之在己的必由之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今本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部分内容颇为强调进攻，斟酌语境，应是出于后世的讹误或篡改。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本《孙子兵法》于此可作参照。

例如，今本“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”一句，指在军事行动中，力量不足就要防守，力量有余则要进攻，如此道理十分浅显，且与孙子的看法相背离。竹简甲、乙本此句则作“守则有余，攻则不足”，强调国家若全力做好防守工作，应对战事就有回旋的余地；而一旦展开进攻，则可能暴露破绽，如此就会出现危险。孙子强调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，使敌人暴露，而不使自己暴露，故竹简本表达的是孙子的原意。

比较有趣的是，孙子这种“善守”而“非攻”的观念被墨家学派所继承。据《墨子·公输》所记，公输般为楚国制造攻宋的器械，墨子前去见他。墨子解开衣带，围成一座城，并请公输般模拟攻城。公输般多次进攻，用尽了器械，却一直未攻破，而墨子的守城之法尚绰绰有余。墨子此举使楚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。

战争的目的是安国保民

孙子论“用兵之害”“非攻”与“善守”，均是其和平思想的体现。由此更进一步探寻，可以发现孙子的观念中，战争的目的在于安国保民。

孙子不是消极避世之人，他论述“用兵之害”，并非否定军事战争，而是提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，须思考清楚战争的后果，如何才能正确把握军事行动的目的。《孙子兵法·作战篇》说，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尽知用兵之利”，所谓“用兵之利”，正是安国保民。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谈道，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可以因愤怒而贸然兴兵，军事将领也不可因一己的悲喜而引发战事，一切都要合乎安国保民的最高利益。

孙子主张“非攻”，正是由于攻城会导致大量民众伤亡，于国家实无好处。所谓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”，在孙子看来，驱使人们像蚂蚁一样攻城，造成大量死亡，最终得到一座没用的废墟，恰是下下之策。

真正的“知兵者”，不是拔城毁国的百胜将军，而是能够切实考虑民众生命与国家安危的人。《孙子兵法·地形篇》讲，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，真正善战之人，在军事行动中不因求取战功而冒险进攻，不因担心获罪而不敢撤退，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出于保全民众，且上合于国家利益。

战争与和平，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。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“止戈为武”的观念，强调加强军备在于谋求和平，而非杀伤攻伐。比《孙子兵法》稍早的《老子》一书讲道，“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为上，胜而不美”，又说“战胜，以丧礼处之”，强调不可推崇暴力、不应美化战争，即使侥幸获胜，也应以丧礼来对待，毕竟没有不死人的战争。观《老子》的表述，可知孙子的和平思想，渊源有自。

（作者系吉林大学“匡亚明学者”领军教授）

历史文化典籍

《孙子兵法》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学著作，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学的重要典籍之一。它不仅是一部军事学著作，更是一部蕴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和政治智慧的经典之作。

君子所，其无逸

□ 郭树伟

“君子所，其无逸”出自《尚书·无逸》，意为君子应养成勤俭节约的自律习惯，力避奢侈浮华的生活追求。“无逸”思想得到历代先贤的广泛认同与解读，《论语》中“安贫乐道”的思想和《孟子》中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理想都是对《尚书》“无逸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；欧阳修的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的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”，诚然也是对这一思想的再次诠释。“君子所，其无逸”，不仅是君子修身的准则，更是治国理政的智慧。

君子立身的道德本源

西周初年，周武王伐纣后，殷商旧贵族势力仍存，姬周新生政权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。《无逸》就是周公归政成王之际的诫子文献，堪称中国最早的“戒逸书”。“君子所，其无逸”，其中的“所”即“居位、居处、在位”之意，指君子居其位、当其职，此处隐喻为君子立身的道德准则。“无逸”可进一步解释为两层含义：一是“知稼穡之艰难”，即须知晓百姓农耕之辛劳，爱惜物力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二是“知小民之依”，此“依”字据孔安国注解为“隐也，知小人之隐忧”，即应体恤他人生活之艰辛，避免奢侈浮华，戒绝田猎嬉戏。

“无逸”是君子自律的核心要求，这种“由己及人”“由小及大”的思维，将个人生活方式与品德养成

紧密地绑定在一起，以此说明追求生活的“逸乐”不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，更是损害个体成长与人格完善的隐患。君子需心怀敬畏、克制欲望、勤勉自持，方能坚守道德本心。反之，若放纵欲望、沉溺安逸，便会逐渐丧失自律，背离君子之道，最终陷入精神空虚与人格堕落。

士人自律的修身准则

春秋时期，具有人格意义的“君子”形象得以诞生。君子从一种社会身份转变为一种文化身份，实现了从上位阶层向平民阶层的拓展。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境，孔子提出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的命题，将“安贫乐道”确立为普通士人精神的核心标识。孔子对颜回能保持恬静生活的态度表现出高度的赞赏之情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同时，他还批评那些贪恋安逸生活的人，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士矣”，一旦个人沉溺于安逸之中，其“士”之精神风貌便荡然无存。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孔子认为，真正的君子之乐，是源于对“道”的执着追求而非感官满足，是在于“克己向善”的德行生活追求和“安贫乐道”的精神世界充实。

《国语·晋语四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晋献公宠爱骊姬，导致晋国内乱。太子申生被迫自杀，重耳和夷吾等公子被迫出逃。重耳在流亡途中历经艰辛到达齐国。在那里，他受到

了齐桓公的礼遇，娶了齐国宗室女子姜氏为妻，生活过得轻松安逸。然而，重耳的侍从大臣担心他沉溺于安逸的生活，忘记了复国大业，于是策划让他离开齐国，继续他的流亡生涯。他的妻子姜氏告诫他说：“怀与安，实败名。”诚哉斯言！一个人生活太安逸了，工作会被逸乐所累，神志会被好心情所惑，留恋家室与贪图安逸，实在是败坏了名声的事情。这种对欲望的警惕和戒惧，构成了士人修身的重要维度。

修齐治平的逻辑起点

《孟子》将儒家的“无逸”思想从个体德行修养拓展至人生实践与社会责任层面。当梁惠王自矜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”时，孟子指出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”孟子犀利批判脱离民生、自我放纵的享乐行为，指出脱离现实、沉溺逸乐，本质是背离道德本心。他认为，逸乐会消解人的精神意志，使人“放辟邪侈”，最终会导致个人堕落与人生失败。相反，能以“无逸”思想规范自己的君子，则能坚守正道、心怀他人，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”。

如果说《尚书·无逸》是从感性认知方面认为“无逸”思想是君子修身立德的重要经验，那么孟子将君子的行为操守转化为道德合理性的试金石，则是从理论层面把“无逸”思想提升为君子道德理想的价值根基。若身边人闻他人享乐而心生不满，说明

未做到推己及人；反之，若众人皆感愉悦，则体现了君子的道德感召力。最后孟子得出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”的结论，将“无逸”思想升华为个人与他人、社会共担责任、共享福祉的道德价值准则。北宋士人范仲淹由此延伸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生追求。

孟子的思想显然更侧重于君子道德伦理的践行，同时也深刻阐释“无逸”之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中也深刻批判了“逸乐亡身”之于个体成长的危害，并提出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著名论断。文章通过历史上的例子，如舜、傅说、胶鬲、管夷吾、孙叔敖和百里奚等人的人生经历，提出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的判断，强调了君子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意志和才能的重要性。北宋欧阳修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之论继承并完善孟子关于“无逸”思想的论述，不仅指出了“无逸”思想之于个体修身价值和治国理政价值，更确认了“无逸”思想是儒家文化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链条中的逻辑起点和价值中枢地位。

中华文明智慧

《无逸》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是周公旦对周成王进行训诫的文献。它强调了统治者应该勤政爱民，不要贪图安逸，要时刻警惕国家的兴衰。这篇文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经典之一。



和顺图书馆坐落于云南省著名的“文化名邦”和“侨胞之乡”保山市腾冲市和顺镇，与当地著名的历史建筑双虹桥和文昌宫毗邻，占地面积5577.34平方米，现有藏书13万余册。历经百余年的雪雨风霜，和顺图书馆依然矗立在三合河畔。它承载着的这座百年古镇的文脉兴衰，同时也是数以万计海内外和顺人的精神家园。

和顺是著名侨乡，归侨、侨眷占全乡总人口的62.7%，主要分布在缅甸、泰国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。在近代，海外的和顺人及其社团，特别是由和顺旅居缅甸的侨胞组成的“和顺崇新会”开风气之先，捐资兴学，倡导进步思想和新文化，直接推动了和顺文化教育的发展。和顺图书馆萌芽于1905年张砺先生等在和顺首倡成立的革新社团——咸新社。该社成立以后，“广购图书以资乡人之阅览，又于每星期日演讲一次，作新文化之宣传，固吾腾新潮流之第一声也”。

和顺图书馆的初创可追溯到1924年。云南省立第二中学的毕业生寸嗣徽，1924年由缅甸回乡省亲时，看到家乡封建迷信盛行，青年思想沉闷，遂与李祖华、李湛春等人在家乡成立“和顺青年会”（和顺青年促进会），共同发起组织“和顺阅报社”。聘请腾冲著名教育家李启慈先生担任社长，并在和顺十字街租得一间小屋为馆舍，订购图书杂志免费为民众提供阅览服务。1925年，缅甸曼德勒、扶允等地的和顺华侨成立的“青年会”和“促进会”在贺宾召开联络大会，后合并为“旅缅和顺崇新会”。该会成立后，总会设在缅甸曼德勒，由于国内外乡人踊跃入会，规模迅速扩大，影响了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和家乡和顺。1928年，“和顺阅报社”在该会的扶持下，正式改组更名为“和顺图书馆”，并迁址到和顺土著庙（原咸新社社址）。至此，和顺图书馆完成了从初创到正式成立的历史过程。

随着图书馆馆藏的不断增多，原有馆舍不能满足需要，和顺乡里开始筹建新馆，于1938年建成主馆并投入使用，当时和顺图书馆馆藏资源已达21800多册。

和顺图书馆的发展，与崇新会的积极筹措、旅缅侨胞的积极捐赠以及乡人们的共同努力密切相关，其主要经费则来源于和顺旅缅侨胞的支持。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“日本侵略军从泰国、缅甸南进，我们（和顺）旅缅侨胞的大部分财产在战火中损失，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经费来源也从此断绝了。”1942年5月10日腾冲沦陷，“图书馆也只得关门，并发动学生帮助把图书疏散到石头山的魁阁藏起来”，“在腾冲沦陷两年期间，除被汉奸破坏了少量图书，通过多方努力大部分藏书都先后收集和保存下来了。”1944年9月14日，腾冲光复，和顺图书馆也恢复正常秩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和顺图书馆仍为乡人自主管理，1980年纳入国家建制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廖承志同志为该馆题赠匾额。1988年，举行建馆60周年庆典，旅缅瓦城和顺联谊会赠送“文化泉源”大匾，国内名人学者钱伟长、顾廷龙、周谷城、楚图南、李希希等题词祝贺。1993年，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2004年3月，被云南省委、省政府命名为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。2006年5月，和顺图书馆旧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8年11月，和顺图书馆旧址入选第三批中国“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”名录。

和顺图书馆旧址为汉景殿，建于明代隆庆年间，为祀奉元末大理总管段功。1928年，将馆址迁移至现在的位置，并采用美国“杜威十进制分类法”对馆藏图书进行编目管理。1938年，在建馆10周年之际，落成新馆，建成一幢五开间中西合璧式主馆屋和中门一座，并举行了隆重的馆庆。编成《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》一册，知名学者胡适、王云五、熊庆来、龚自珍、李根源、李曰垓、周钟岳等题诗、题词。其中有张天放先生题的“和顺图书馆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”。

和顺图书馆坐东南向西北，由大门、二门、主楼、藏珍楼、中华再造善本藏书楼等建筑组成。和顺图书馆大门为牌楼式木构建筑，面阔3间、宽度为11.7米，进深2间、长度为3.3米。进门

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的乡村图书馆

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

□ 陈果

即是明间，梁上有题记“大清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清和月吉旦·合乡土庶等同建”，内悬匾额一块，上有正书线刻“汉景殿”三大字。上额为本土乡人张砺书“和顺图书馆”匾，下额悬赵翼荣“文化泉源”匾；二门砖石结构，仿江苏苏州东吴大学校门而建，门墙呈一字形，长77米，设3个拱形门洞，中门宽22米、高3.8米，两侧门各宽1.3米、高3.1米；主楼抬梁式木结构，面阔5间、18.7米，进深2间、8.6米，两次间前各伸2米施二柱，所伸二柱与主楼相连，形成半亭，屋顶飞檐翘角。

和顺图书馆主楼后檐下悬有正书“咸新社”匾额，匾长2.2米、宽0.58米；主楼后为藏珍楼，为两层钢筋混凝土楼房；主楼右侧为“中华再造善本藏书楼”。该址原为“景山园”，2009年在此建成一正两厢木结构楼房，内置原文化部、财政部规划编纂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、分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，共787种、9211册。

和顺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标杆性乡村图书馆之一，于2023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。馆内建有古籍、分藏古籍、民国、中华再造善本、现代等书库，典藏文献图书较为丰富，至今仍为和顺乃至腾冲的文化、教育事业发挥重要作用。8000余人的和顺古镇，办理的借书证超过3000张，既有当地乡邻，也有来和顺古镇旅居的游客，还有在附近工作的居民。2025年和顺图书馆图书外借约19万人次、超21万册次，总流通人次超65万人次，电子书下载约5000册次。

和顺图书馆既是为当地乡民服务的乡村图书馆，又是传承、传播当地文化的重要阵地。它不是单纯的历史遗迹，也不是一个单纯用于阅读学习的场所，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给来到这里的所有人提供的信息服务、送去的精神食粮，还在于它对自身所承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。

（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）

